

第一章 緒論、問題意識與方法

1.1 研究背景—本地廣電產業的具體現象

台灣的電視事業，年歲至今四十有二。以有線電視的合法化為界，前三十一年因黨國機器的羽翼，無線三台能寡占全部的電視窗口¹並且主導了生產規則與資源分配法則；後十一年，則是在民主自由化的符令下，轉而成為財團與跨國資本馳騁逐利的競技場。

但無論是在哪一個時期，由國家抑或是資本企業主宰電視的經營，台灣的電視表現並不令人十分滿意。早年掌握實權的台灣總統(行政院長)與政治人物(組織)，都曾對公開指責電視不良的節目(馮建三，1995: 5)，比如民國六十四年蔣經國就電視節目追求低級趣味而俗爛的現象加以批評，他說：「大眾傳播工具中，以電視之效果最大，其所製作的節目，不能見利忘義，能為金錢而放棄我們的主要原則。」(新聞局 1983 年 10 月 29 日頒佈的「電視節目規範」前言，轉引自前引書)。八十一年半官方的「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成立²，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在其召開的會議上指「電視事業雖然要講求利潤，但是計利當計天下之利 否則製作人若一味地想賺錢，和販賣毒品有什麼差別？」(聯合報，1992.10.29: 22)。晚近針對電視節目競逐收視率而使忘卻品質與社會責任的批評，更是所在多有，比如演員江霞任台視董事時，痛陳媒體為了收視率無所不用其極，散播似是而非的觀念云云(聯合報，2004.02.28: B2)。特別是近五年來，要求媒體自律的呼聲不絕，監督評議媒體的市民組織³紛紛成立，報端上批評電視腥羶色的投書為數亦不能算少，這些現象都證明

¹ 國民黨政權以軍事與國家安全為名，刻意扣留三台以外的電波頻譜，賦予三台寡占電波市場的「合法性」。見鄭瑞城(1993)的研究。

² 「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是附設在「文化總會」下的次級單位。「文化總會」的前身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其會長向來由現任總統或行政院長擔任。

³ 如民國八十八年成立「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定期發表監看報告；九十一年成立的「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則主張循法律途徑制衡媒體；近期較活躍的有由多個社團組合組的「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向廣告主施壓要求撤不良節目的廣告；或有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及其改組成立的媒體改造學社，是對當下電視不滿而思變，著力於結構改革的運動社團。

節目品質不甚高明。

然而專事節目生產的人，多是以在商言商的態度回應指責。在三台獨家時期，時任台視總經理的石永貴面對社會輿論不滿電視的聲浪時，作如下回應：「電視要面對的是多數人，通常的對象不是(會批評)的知識份子 一個商業電視就是決定在收視率 我們三家商業電視台的環境是很現實的。」(遠見雜誌，1987，四月號: 38)。當今，則有製作人沈玉琳因為節目《愛的郵差》、《幸福委員會》、《最後的晚餐》內容太具爭議性受到廣泛批評，卻以「收視率已證明大眾主流市場的喜好，觀眾愛看，只要製作單位有先把關過濾，為何不能播？」為由辯解(聯合報，2003.09.30: D2)。2003年中在三立熱映的戲劇《台灣霹靂火》，衝突劇情過於激烈引發議論，難得編劇鄭文華有自知之明自承節目品質不佳，以「像泡麵一樣的垃圾食物」形容自己的作品。言猶在耳，垃圾劇中涉及司法的情節因疏於考察而錯漏百出，遭司法人員投書報端糾正，製作人周金陵卻還是老著臉皮說「劇情比較誇張，喜歡看的觀眾很習慣，不喜歡的就轉台吧，有這麼嚴重嗎？」(聯合報，2003.07.03: A5)。言下之意，節目良窳的責任其實應由觀眾一肩扛起才是。

1.2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現象的反思

如果生產者可以不用對產品的成敗負責，那麼消費者的批評與怒氣該往何處傾倒呢？這個答案對經濟學家來說簡單，因為消費就是在表達個人的性格與意願，價格的變動就反應出這種動機，透過價格機制便可以將需求好惡傳達給生產者。在電視界，收視率更是比價格機制直接的指標，是觀眾好惡的集合表徵，所以電視節目的收視率既然高了，何必旁人指教？觀眾要是不滿那就別看，既然看了那就閉嘴，反正節目是配合觀眾的需求去生產的。資深主播兼電視人李豔秋不是有言「有什麼樣的觀眾，就有什麼樣的媒體」(聯合報，2002.08.09: 11)？雖然她曾抗議長官將她當成傀儡搬弄腹語術，但被觀眾當成傀儡卻是心安理得。

那麼身為供需之外的第三人的研究者，要如何分析這些現象呢？奧國經濟學家米塞思(Mises, 2001: 41)有經典主張：「為了科學的目的，我們(研究者)應該從個人的行動出發，因為這是我們可以直接認識的唯一事物」。因為「現代經濟學既沒有也不能關注一個人是喜愛健康的食品還是毒品；無論支配他

的倫理或其它是如何邪惡，它的『正確性』並不是經濟學要判斷的問題」(ibid: 91- 2)。由此可知，與其費事批評生產者泯滅良心，不如化身為生產者去研究消費的可能性何在更為實際。對米塞思這位素未謀面的後生對經濟學的看法，馬克思是甚感同意的：「如果我藉由讓自己變成娼妓，讓人發洩性慾來賺錢，那麼我算是遵守經濟學法則嗎？他們(經濟學家)的回答一定是：你的行為並沒有違反我們的法則，但是你應該想想道德與宗教兄弟會怎麼說」。此話不錯，因為發洩性慾是人之所需，正合生產者無利不鑽的精神。兩相比較，我們便可知經濟學家關心的是行動本身；先於行動的部份，是牧師、傳道者和哲學家的事情。

所以說，李登輝見著電視亂象不滿，以毒品比喻無良的電視節目，果然富有傳道者⁴的精神，但也就透露了對經濟學的無知。而石永貴、李豔秋、沈玉琳、鄭文華這些節目生產者有了收視率撐腰，面對批評無懼無畏，可見不只有做熱門節目的專長，還很受過一點經濟學訓練。

然而，兼有道德良心、哲學素養和經濟胸懷的研究者，如何自況呢？自馬歇爾(A. Marshall)以《經濟學原理》一書為純數的新古典學派取得經濟學正宗後，這類研究者只好繼承先人名諱，稱之「政治經濟學」⁵。其不滿於供給與需求的解釋是一種內向的循環論證，是自證自成的功能論取向，遂要從生產的面向拆解權力與資源的流通分配過程，這即是本研究自我期許的一種主義及立場，在研究方法一章中會作進一步交待。

本研究要指出，節目製作者儘管可以用收視率自我安慰兼幻想藉之杜悠悠眾口，但是台灣作為影視產業進口的大宗國家是不爭的事實。當消費者揮舞著雙手擁抱外來影視產品，其勢嚴重到主管機關以編列預算的方式補助電視劇攝製⁶，豈不說明了在地節目的生產有其根本的問題。特別是編劇鄭文華

⁴ 李登輝曾表示「不作總統，就作傳道人」(聯合晚報，1993.02.19: 15)。

⁵ 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 Golding 與 Murdock(1991:18- 9, 轉引自 Mosco, 1998: 56)指：「[政治經濟學]超越了效率的技術性議題，進入了正義、平等與公共財等基本道德問題的討論」。

⁶ 2003 年中，新聞局提出一億八千萬的預算，鼓勵製作「優質電視劇」。時任局長的葉國興在立院中報告指「有線電視競爭激烈，業者為降低成本，多購外片播放，導致晚間八點檔近 20 部電視劇竟只有三分之一為台灣自製，餘多為港、日、韓、大陸片，國內製作能力日漸萎縮」，因此要仿效電影輔導金政策補助電視劇拍製(民生報，2003.05.06: A11)。對比於台灣電影產業的蕭條，主管官員此語令人心驚，可知本土製作水平低下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為《台灣霹靂火》的劇情錯漏找理由時，稱「由於時間壓力，發生錯誤是難免的」；或有製作人因預算不足，拍戲盡是那三廳五景，在道具上偷工減料只求差強人意；或是近年大行其道的置入式行銷，要偷渡產品形象到內容之中，在在反應了節目生產內在存有根本的問題，而與消費端的收視率無涉。

那麼，要如何從生產面向下手，以理解節目製作內在問題何以致之呢？本研究認為，節目創作作為一種生產歷程，既然被擲入資本主義的市場中進行，則不免時刻考量消費的需求為何，因此研究生產究竟如何，得先從研究商品化的脈絡開始。生產者以什麼樣的腦袋，將節目當作是什麼樣的商品，將決定了生產的歷程，以及其中資源流通分配、權力誰屬，以及商品本身最後的形貌與性格。因此我們第一要問，電視產業中被交易的首要商品是什麼？再問，這個商品的購買者為何？三問，商品的生產者如何設想、回應購買者的需要？四問，資源的分配如何因商品化的想像而流動？五問，資源的分配，透露了生產的過程中權力誰屬？六問，生產者對購買者的想像，如何決定了生產的過程與次序？最後，商品化的歷程，如何實質地影響了商品最終的樣態，成為我們所認識接觸到的節目？

1.3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出發點，來自對本土節目粗製濫造的不耐，而想要去找出生產面向上造成問題的結構性癥節。初步的研究架構如下：在研究方法一章處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與立場，並交待分析工具。而後就過去關於電視產業中的商品的定義爭議，再作理論性析辨，藉以釐清問題意識，理解分析的焦點與範疇。接著作文獻的整理，確立過去研究的不足與本研究可再著力之處。然後進入研究本題，以台灣的電視產業發展史為主要分析對象。最後是結論與建議，收尾。

1.4 研究方法

我們要尋找的，不應該是一件產品的各個組成部份，應該去了解的是這件產品的諸多製造條件。

RaymondWilliams, 1980: 47

1.4.1 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

傳播研究可以分成若干流派，有的專注於文本(text)內含的意義分析，用符號學、語義結構挖掘潛藏在字裡行間或影像音樂裡的意識型態；有的關心內容的傳播效果(effect)，以實驗、統計或調查方法探詢傳播內容左右受眾觀感認知的可能；有的眼見事實與新聞再現間的落差，以內容分析法指出誤差的所在；有的著重於閱聽人解讀的策略與應用，深入觀察記錄其接收訊息的過程與詮釋方式。不同前面這些研究取向著力於媒介意義的建構和消費，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焦點，在公開的傳播(public communication)中「符號」和「經濟」兩個面向間的互動關係。簡單地講，這個方法指出透過不同的經費來源和組織方式進行的文化生產，勢必影響到公共領域中論述和再現的範疇，也勢必影響到閱聽人近用哪些論述和再現(Golding and Murdock, 1995: 32-3)。其特別關心的是，在文化生產這一端上「權力」施展的過程，目的在了解宰制階級如何透過掌握「所有權」而發揮影響力，控制了生產過程，並左右了最終產品內含的意識型態，使其為體系服務，從而解釋權力、聲名及財富不公平分配的社會現象(Hesmondhalgh, 2002: 30-2, 37)。亦即要去分析某些特別的社會關係，使得某些人有了權力或能力控制其他人、過程及資源的關係，即便受制者會有反抗，這樣的關係仍然存在。

分析權力的運作方式，也有若干不同的途徑，在政治經濟學者的眼中，權力運作是一種政治行為，而這種政治行為不能脫離經濟領域的分析。特別是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則普遍化後，關注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的後設立場更為重要。所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起點，就是要先體認到大眾傳播媒介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下，「最先並且最重要的」(first and foremost)生產與分配商品的工商業組織。所以必須先掌握媒介生產訊息與文化實踐的經濟動態過程與脈絡因素，才有可能充分理解意識型態的問題(Murdock and Golding, 1974)。

如此一來，政治經濟學不變的關心就在於分析社會關係與社會權力的結構，但其特別在意社會權力的體系特性，也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因此更為具有概括性質，同時企圖心也更大的定義是，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生活的控制與存活」。控制特別指涉了個別及團體成員的內部組織，而存活則指涉這些成員運用手段來生產他們再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大大小小的控制過程大致是政治屬性的，涉及了社群之內各種關係的社會組織；存活過程則是

經濟屬性的，涉及了生產與再生產(Mosco, 1998: 42-3)。經濟力量的掣肘，或是經濟與政治力量結合，才真正是主導大眾媒體走向的關鍵，不可分立而論述之(馮建三，1992c: 22)

同時著力於生產的諸般條件分析的學門，還有以新古典(neo-classical)流派為主的現代經濟學⁷。他們與新自由主義互為表裡，堅信個人理性與行動的能力，堅持市場競爭與多元論述為最終價值，用複雜的數學與求簡的科學，模型化社會事實間的相互關係，定義可以量化的變項，以求得靜態的均衡解。一般認為，這些方法無法解釋歷史的轉型，特別是出現大落差及動盪的轉型期，也就忽略了歷史性和社會整體性的分析⁸(Mosco, 1998: 77; Hesmondhalgh, 2002: 28)。

對比於新古典的分析方式，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視野，雖然同樣把傳播事業當成一種經濟組織來研究，但與新古典的首要區別，就在於其從道德哲學的關懷出發，超越了效率的技術性議題，著力於分析生產與供給勝過於消費或需求，並主張前者更具決定性。特別是要指出體系是由不羈的行動者構成，因此失調與不公平的問題與其對穩定工作及體系延續的威脅，都是必須研究的常態，凡此種種皆不同於均衡假說(Garnham, 1990: 7; Mosco, 1996: 56)。也就是說，政治經濟學特別看重晚期資本主義的調查和描述，而且還將晚期資本主義定義為動態的、不可測的、歷經變遷和實質上未完成的。與本質論者那種抽離了特定歷史時空的研究途徑相較之下，強調歷史觀是批判分析獨樹一幟的地方(Golding and Murdock, 1995: 35)。更進一步，它指認傳播事業的直接功能在透過商品(節目時段)的製造與交換生出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間接功能則在透過廣告，給其它生產部門的產品添加剩餘價值

⁷ 現代經濟學其實是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變型。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加圖(Ricardo)、米爾(J. S. Mill)等知名的政治經濟學者為例，關注的社會現象無所不包，及於政治、倫理、軍事、外交等事務。但在邊沁的功利主義與科學理性的推波助瀾下，研究典範愈走愈專，而致於集中心力分析成本與效益、供給與需求間的平衡關係。一般認為十九世紀末經濟學家馬歇爾(A. Marshal)寫就的《經濟學原理》，是當代的新古典經濟學與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分道揚鑣的濫觴。然當代經濟學又分有不同流派，理論方法與視野互有不同，有的也嘗試作動態、歷史性的分析，比如制度經濟學與倫理經濟學對於法律運用的貢獻，但在方法上仍不脫數理模型的工具分析，也就是在認識論上仍繼承新古典的「效用極大化」的假設及以「理性行動者」基礎的分析路徑。以上參見 Mosco(1996:74-83)、Heilbroner 與 Milberg(1995)、Bell(1989: 73-128)與《當代》(第 180 期)中關於當代新古典經濟危機的討論。
⁸ 比如文化人類學者博蘭尼主張市場行為是一種社會鑲嵌，他透過考察不同社會市場樣態的轉型，認為經濟應由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制度化過程去理解，而形式經濟學的對此的解釋力並不足夠(Polanyi, 2000: 38)

⁹(Garnham, 1990: 30), 也就將傳播事業的經濟功能, 置放到更大的社會脈絡與歷史意義中去觀照, 也就是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功能性, 而不是只在成本效益上計較, 或專注於組織間的競爭策略與產品市場的管理問題上打轉。其藉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工具, 指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意義的生產與交換, 如何與經濟活動發生關係; 政治與意識型態的操弄, 如何因為經濟趨力的運作而執行。說到底, 對於政治經濟的研究取向而言, 正因為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抽象、最基礎的社會關係型式, 是一種預先決定的物質關係的歷史性論述(a historically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of a predeterminate material relationship), 所以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經濟分析, 始終占有主要的位置 (ibid: 26; Mosco, 1996: 152-7; 馮建三, 2003: 105-7)。

這種以物質條件為起點的經濟分析取向, Garnham 稱之為「歷史唯物論的觀點」(historic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¹⁰, 被劃歸於認論識中的實在論 (realism) 範疇, 也就是假設實存的物質世界外在於我們的意識運作過程之外, 其具體的屬性最終都是可以感知與理解的。意即我們可以對獨立的真實存有得致客觀的知識(Garnham, 1990: 3; Hesmondhalgh, 2002: 44; Mosco, 1996: 199-200), 如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指出(轉引自 Giddens, 1994: 53):

這種視察方法 是從現實的前提出發。 它的前提是人, 但不是某種處在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下的人, 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 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 是一些僵死事實的搜集, 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 是想像的主體的想像的活動。

也就是說, 理論的建構不只屬於現象面, 還應存於真實世界中。有鑑於

⁹ 另可參考 Jhally(1992)所謂的「意義填空」。另見 Ryan(1992:65-73)的說法。

¹⁰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說法是:「歷史觀的內涵就在於詳細說明真正的生產過程—從生活本身的物質生產開始—並且要掌握由這種生產模式所產生的以及與這種生產模式有關的各種互動形式, 意即, 於不同階段的市民社會是所有歷史的基礎; 要描述市民社會作為國家時所採取的行動, 也要解釋從這個基礎上所產生的所有不同的理論產物及意識、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形式, 如此, 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從整體的角度來描述(也可以從它們彼此的互動中來描述)」(轉引自 Hobsbawm, 2002: 273)。馬克思主義史家霍布斯邦(ibid: 268-86)對歷史唯物論再作辯析, 指出生產模式是生產關係的總合所構成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 以及形成此社會存在所仰賴的物質條件發展。這是我們理解歷史動態的基礎, 可以顯示社會團體間運作的不同力量。而要分析生產模式, 必須立基於可見的物質生產力進行研究, 也就是要研究技術、組織與經濟學。

此，批判性分析十分關切行動和結構的問題，嘗試辨明在真實世界中形塑人們生活和機會的真正限制。就這層意義來看，批判的政治經濟學顯然是屬於物質論，強調人們與周遭物質環境的互動，關注物質資源不平等分配的問題以及符號環境不平等的本質所產生的後果(Golding and Murdock, 1995: 35)。

對結構的關注，顯然是出於馬克思主義將社會分成底層/上層結構的後設認識(base /superstructure metaphor)。藉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經典主張：「物質生產的生產模式決定社會、政治與精神生活的一般性格。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相反，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經濟基礎一旦改變，整個巨大的上層結構亦隨之而或快或慢地轉變」，政治經濟學要爬梳「經濟基礎的改變」或「社會存在」如何能切實影響了媒體內容的生產。然而如此一來，也就必免除不了面對針對這種唯物認識論所作的批評：諸如過於重視經濟決定因素，採取化約主義看待問題(Hesmondhalgh, 2002: 31, 45-6)，以及忽視行動者的能動性等等。對於此，傳政經研究的宗師 Golding、Murdock 與 Garnham 都有回應，指出文化、意識型態等上層建築既然矗立於基礎之上，那麼將兩者視為互相影響、互有關聯的社會型構總體加以分析，就是必要的，這也是 Mosco(1996: 201)所謂的相互構成(mutual constitution)的意思。然而政治經濟學雖然聲稱經濟因素絕不可能為傳播活動的本質提供完整的解釋，但仍必須認定所有的社會權力型式皆與經濟相關，因此更加重視決定力量的階層性(hierarchy of determinations)，並將其間的相互關聯性作為分析重心。說到底，經濟決定的力量是率先運作的，也就是說，經濟動態乃是傳播活動發生的環境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特點(Golding and Murdock, 1995: 37-8, Garnham, 1990: 23)，是分析的起點。

經濟條件如何率先運作？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決定性」(determination)的定義再作釐清。本文擬採用 R. Williams(1980: 34)的說法：「(決定性是)諸多限制的集合與壓迫行使的過程，而非是可預見的、預想好的和被控制的概念。」也就是說，「決定性」是指一組施加於行動上的限制集合，但不預先決定行動的邏輯，不否定行動者超越限制的可能。Williams(ibid)接著主張：

我們也必須重新認識「上層結構」，將其視為與「文化實踐」相關的範疇，它不是反射性的、重製性的、或是具特定依賴性的。更重要的，我們還必須重新認識「底層結構」，不將其當作是僵化的經濟或技術性的抽象概念，而是在真實的社會與經濟關係中人類的具體活動。其中包含

有基本的衝突與差異性，所以永遠是處於動態的狀態裡。

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分析，以底層/上層結構的概念出發，不是要將分析對象當成是一種客觀的產品來拆解並加以批判，而是要去理解在歷史及社會總體中，這個產品的製作本質及其生產的諸般條件(nature of practice and its conditions)(ibid: 47)，其又與構成底層(base)內涵的生產關係、生產方式或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階段等等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相互呼應。

綜上所述，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可以歸結出幾個特性：一．在研究旨趣上，從經濟觀點出發針對傳播現象中權力施展的過程予以了解，也就是要揭露政治與經濟如何作用於文本生產，最主要關心生產模式與生產關係的變遷；二．在認識論(epistemology)上，採取實存論及唯物論的立場，指出客觀真實確實存在而可為人所指認了解；三．在本體論(ontology)上，採取全觀的、歷史性的分析方式，認為人是在繼承來的歷史條件上創造歷史，分析的單位是社會結構而非個人，著重的是社會變遷、社會過程與社會關係。四．在學術立場上，拒斥價值中立的說法，指出研究者道德關懷的必要性，並以實踐理性為知識論的基礎，或自稱發言位置出於馬克思主義陣營(馮建三，2003: 106-7; Golding and Murdock, 1995; Mosco, 1996: 45-62; Hesmondhalgh, 2002: 31)。

1.4.2 研究方法—文獻分析為主，訪談為輔

本研究以政治經濟學的立場出發，首要在作歷史的考證與詮釋，並試圖在結構層次進行總結論，因此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其中民國五十五年始每月發行的重要產業文獻《廣播與電視》，留有橫跨三十年中台灣電視工作者的經驗紀錄與市場資料，是分析時的主要參考來源；另外電視工作者本身的回憶錄或傳記，如前台視節目部主任何貽謀(2002)所著《台灣電視風雲錄》、華視的催生者劉先雲的口述歷史《劉先雲先生訪談錄》，對本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其次是專門探討廣電產業的學術論文或專著，如鄭瑞城(1991)等著的《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以及不同時期由業界出身的教授撰寫的產業教科書，如宋乃翰(1962)著的《廣播與電視》、蔡念中與陳清河合著(1996)的《電視節目製作》、顏伯勤(1990)的《廣告學》，其中隱含著節目製作與媒體經營規則與條件的遞變，亦是分析對象。最後是報紙中的新聞資料，也是參考來源的大宗，此部份藉重聯合報的電子資料庫《聯合知識庫》

及中國時報的《中網新聞網站新聞資料庫》，透過關鍵字の設定得以有效率地作剪報整理。

然而文獻資料不足以涵蓋產業規則的全貌，因此本研究設定另以深度訪談法為輔助分析工具，一方面除與文獻記錄相互參照及修正，二方面亦補文獻記錄之不足¹¹，特別是近五年的電視產業規則瞬息萬變，更有待業界工作者的口述資料填空。訪談對象的選擇採立意抽樣，以具有長時間業界工作經驗者為佳。但本研究並未計畫對訪談內容作系統性的整理及歸納，主要因為時間資源限制，訪談預計無法達到兼具信度與效度的規模。訪談的對象整理如下表：

表 1.1 訪談人員名單

姓名(依姓名筆畫排列)	工作單位 (職稱)	訪談時間
孔慶霞	百事傳播 (製作人)	2004.07.21
王中平	資深編劇	2004.06.30
王天興	衛視中文台(製作人)	2004.07.14
林曉君	三匠傳播 (副導)	2004.07.16
張惠琴	台視(業務部業務代表)	2004.07.16
趙大同	民視 (監製)	2004.07.16
鞏逸萱	民視 (節目企製)	2004.07.12
錢在仁	台視 (業務部業務代表)	2004.07.16

¹¹ 文獻記錄之不足，亦和研究者的識見與資源(時間、空間)有關係。

